

中国历代
诗歌别裁集

〔清〕沈德潜等 编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中国历代诗歌别裁集

〔清〕沈德潜等 编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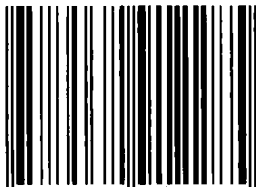
787×1092 十六开本 101.375 印张 6 插页 1540 千字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9-1228-0/1·1082 定价：280.00元

ISBN 7-5329-1228-0



9 787532 912285 >

《中国历代诗歌别裁集》与诗选学

——代出版说明

语言符号，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的，并且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扩大而日趋丰富、深化及完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诗歌就诞生了。这是世界艺术的规律，中国亦当如此。就诗歌的发生而言，它虽然是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外在世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发生联系时，使人有了一种新的感觉，这种新的感觉急欲倾吐出来，于是就形成诗。可以说，没有感觉就不可能有诗的产生，没有新的感觉就不可能有新诗的再现。诗的本质当属于感觉；诗的发生发展的历程，是感觉的发生发展的历程。中国文学虽然尊重诗的感觉本质，但是更为重视诗教辅助政教，甚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教就是政教，因而中国的诗歌不单单为文学自身发展的动力所推动，更多的则为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乃至经济的、军事的、哲学的力量所推动，从而使中国诗歌特别发达、特别繁荣，可以说代有新的诗歌形式产生，代有诗歌晶莹作品问世，并且前后相继，汇成了中国诗歌的长河大波，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而称中国为诗的国度，这是古今中外的共识。同时，由于中国诗歌一直居于中国文学殿堂主尊的地位，还影响着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催促着其他文学样式的诞生，细细寻绎，中国文学的其他样式都与中国诗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果要论中国文学传统，如果要认识中国文学，中国诗歌又是最为重要的着眼点及主要途径。至于中国古代先民还以诗会友，以诗论政，以诗使交，诗歌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孔子曾经倡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自此圣训一出，诗学又为之大兴，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人生、中华民族的历史，又都与诗歌有着血肉一样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诗歌又是研究中华民族精神的最直接的资料，

同时这种资料又直接透出中华民族精神。所以，不论从哪种角度观察，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诗歌当是最值得重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们重视这份遗产的时候，当然又是在我们发扬这一优秀文化传统的时候，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我们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那就是中国的诗选。诚然，就整个诗歌史观察，诗歌创作是本原性质的部分，没有诗歌创作，就没有诗选的产生，这是不言而喻的。就此，我们应该首先注意诗歌创作，只有从诗歌创作的发生、发展、繁荣的整个过程予以深入进去，才能认识中国诗歌的本质、个性、流派、功能等因素构成的全貌，才能说诗、论诗，继承中国诗歌这一最为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同时，我们决不能回避中国诗选学及其诗选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在中国诗歌发祥时期，文字尚没有产生，或者只有个别文字，并不能递传诗歌创作的全貌；或者由于当时递传媒介的短少或者贵重，诗歌不能尽载于典籍，绝大多数的诗歌仅仅只是以口传的形式予以传播的。这些情况虽然没有影响诗歌发祥阶段诗歌创作的继续，但毕竟使不少诗篇得以泯灭。孔子周游天下，道不得行，晚年退回乡里设帐授徒，同时开始搜集整理古代典籍，于是《诗三百》就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从此有了中国诗歌的第一个选本，从此，孔子之前的中国诗歌有了一个总汇。在封建时代，《诗三百》被钦定为「经」，有了《诗经》的称谓，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愈益广大，意义愈益深远，这是早已有了的定论。我们撇却这些，仅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观察，首先是它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中国上古时代的诗歌，从而使我们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的诗歌有了最直接的资料，为研究中国诗歌史提供了基础；其次，是它确认了中国诗歌发展形式过程中四言诗的时代，除了四言诗为一种诗体形式继续有着它的独特地位外，同时还由此孕育出五言诗、七言诗、杂体诗等多种诗歌形式；再次，孔子删诗定诗有一定的圭臬，即《尚书·尧典》所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后来孔子简化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就直接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基本品质和走向，并且在「诗选」产生的同时也开启了「诗选

学」。应当说，孔子《诗三百》的选定及其传播，在中国诗歌史上为开天辟地之功，因而由此认为中国的诗选学在中国诗歌史上亦应有开天辟地之功。

距孔子《诗三百》之后六百余年，汉代刘歆曾编选一本《楚辞》，当然并不尽如我们目前看到的《楚辞》。我们目前看到的《楚辞》，先是经过王逸的增删，后又经过朱熹的增删，篇目有很大的变化。从这一变化，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楚辞》是《诗三百》后的另一部诗歌选本。其一，它认定了楚辞是变风变雅的一种诗体，这种诗体又称为骚体。在悠久的中国诗歌史上，骚体不止千百年来有着独立的地位，同时它还影响着其他文体的形成、完美，如汉的大赋，如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它的对一种新诗体的肯定，功德可以彪炳天地。其二，它保留了远距中原地区的楚的精美之作。它的词藻之美，它的节奏疾徐，它的思想深广，它的作法的诡谲，至今依然为世界注目。其三，它所显示的创作方法——香草美人之思，直接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寄寓的确定、完美，从而使中国诗歌更自觉地进入艺术创作的深境。更为重要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一种创作模式，直接影响着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诞生，直接影响着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地位的确立，直接影响着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弘扬。也应当说，《楚辞》的选定及传播，是踵继孔子诗选之后的又一高耸入云的丰碑。

诚然，我们讨论中国诗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可以凭藉的材料很多很多。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在有文字记载之后，就有文学创作的记载；因为在没有文字诞生之前，就有文学创作的产生，艺术前的艺术这一领域的开拓以及随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现代发掘的成果，将会实证这一领域确定的现实性。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正视《诗三百》及《楚辞》所保留的中国文学史发祥阶段资料的丰富性及可信性，我们不能不正视《诗三百》及《楚辞》所遗留给后人的中国文学史发祥阶段作品的典则性和永恒性。有人惊叹《诗三百》和《楚辞》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至于《诗三百》和《楚辞》在它之后的影响，虽然它划出了中国诗歌发展的走向，但远远不止于此，还有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

等等方向。由此不难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诗选学有着与诗歌创作同等重要的意义，甚而在某些方面它还远远超出了诗歌创作本身的意义。

如果说孔子、刘歆的诗选工作还只是个人的文化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视汉的设置乐府及唐的以律取士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行为。诗的作用是什么？诗又有怎样大的作用？《毛诗序》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止于诗。」这就是诗的作用，这就是诗的作用大到什么程度，所以汉设置乐府以采诗，「以观风俗，知厚薄」，于是这一社会文化行为，使汉的诗歌以乐府诗为最，「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林林总总，推波助澜，一直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构成了这段历史时期的主音。当然，之后的历史时期仍然在诗苑中有乐府诗的地位，这应当说是汉魏乐府的附骥，是汉魏乐府的发扬，直可视为汉魏乐府的余唱。

还由于似「《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竟然开以律取士的科举之风，这就造成了从上到下、从内地到僻远习诗作诗的风气。一旦诗篇选中，就会跳过龙门，天地为之一变，所以唐诗的繁荣，唐诗的辉煌，并造成举世瞩目的效应，其中重要的原因，当由于这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

总之，不论是个人的文化行为，还是社会的文化行为，推动了中国诗歌一波一澜地向前发展，造成了一峰一巅地向高处攀登，于是使中国有了诗国之称，于是使中华民族有了诗一样的灵魂，于是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染上了诗的色彩。由此完全可以说，诗选学不止应该设立一门专门的学科，同时还应该在中国诗歌史上大书特书。当然，中国很早就有了「选学」的学问，这源于梁萧统的《昭明文选》，后经唐李善作注的推崇，从而使之成为中国的一门显学，到清季乃至达到铺天盖地、无以复加的程度。《昭明文选》留给后人

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事出乎沉思，义归乎翰藻」，对之后的文学选本确立了根本的标准。这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文选》是各体皆备的文学总集，并不尽为一个诗歌选本，以《文选》为代表的「选学」，并不能涵盖诗选，也不能代替诗选，决不能因有「选学」的存在，就排斥诗选学的建立。

当然，无论如何，对于诗歌史来说，诗歌创作仍然是本原性的内容。没有诗歌创作的存在，就没有诗歌史的存在，也就没有诗选学的存在。因此，我们在讨论诗选学对诗歌创作推动意义的时候，决不因此而否定诗歌创作本身的意义。在我们看来，作诗、选诗、论诗，三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并且以诗歌创作为主，彼此互相推拥，互相发明，从而造成了中国诗歌王国的辉煌。诗选的特定义，是在于中国文学发祥的阶段，又在于汉至唐这个历史时期，之后随着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发展，虽然诗歌仍作为雅的一种标志或身份，它的社会意义则显得不像唐之前那样高贵，所以由诗而衍变的词被称作诗余，而由词而衍变的曲被称为词余。对这种文学现象，不论作文学创作内部规律的说明，还是作外部规律的说明，都不能漠视诗的社会功能这一逐步嬗变的事实。因而选诗的工作，决不限于圣人之为，也决不再限于是一种社会对个人价值判断的门径，而形成为社会更多个体的一种崇尚、一种宣扬、一种追求，于是自唐以来，各种诗歌的选本就逐渐增多起来。这其中有某种诗体的，也有某种诗题的；有某种风格的，也有某种流派的；有某个个人的，也有某个地域的……我们不能说，它们之中没有好的选本，更不能说每个选本中没有好的诗作，只是由于选诗者所抱的功利主义的态度不同，所持的诗歌选判的标准不同，所以它们都没有产生像《诗三百》及《楚辞》那样大的轰动。尽管在传诗方面，它们保留了较为珍贵的资料，但多是囿于版本文献意义方面的。于是诗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进入了杂多而滥漫的阶段。

力挽这一局面，并能追步古代先圣的，为清初的沈德潜。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常州（今江苏苏州）人，乾隆时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生活在明代前后七子复古主义余波的文化氛围之中，虽然曾有王渔洋提倡神韵说以矫时弊，但其说只主神韵而不能「宏博」，故力量非常脆弱。至于沈德潜本身则认为：

「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是学诗的正途，当然又是矫正当时粗疏空寂文风的正途。而他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时竞尚宋、元，适相笑也」，孜孜矻矻，近三十年，成就《唐诗别裁集》「二十卷，得诗一千九百二十八章」。之后，他又观瞻明前后七子独倡「诗必盛唐」弊端的根由，在于「株守大过，冠裳土偶，学者咎之。由乎唐而不能上穷其源，故分门立户者得从而为之辞」，所以，在倡唐的同时，还必须追溯唐诗之源，于是「兹复溯隋、陈而上，极乎黄、轩，凡三百篇、《楚辞》而外，自《郊庙乐章》迄童谣里谣，无不备采，得十三卷」，称之为《古诗源》。尽管他自称「不敢已尽古诗」，「而古诗之雅者略尽于此，凡为学诗者导之源也」。虽然沈德潜推崇唐诗，又倡导必须循古诗之源，但并不厚古薄今，对于当代的诗歌创作也非常肯定，所以他又另外编选《清诗别裁集》。当然他编选该集有「颂圣」的意思在，尽管《清诗别裁集》选诗起于清初，迄于乾隆二十五年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仅是清史的三分之一强），却录入诗歌九百九十六家、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是他所编诗选中最为浩大的一部。不过，他笃行选诗的原则，使他并不「悦权右取薄媚俗」，从而使这一诗歌选集仍然有着非常突出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至于明诗，他也取非常谨慎的分析态度，认为「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鑣并轡，然犹存元纪之余风，未极隆时之正轨。永乐以还，体崇台阁，骖馱不振。弘正之间，献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实、昌穀左右骖靳，古风未坠。馀如杨用修之才华，薛君采之雅正，高子业之冲淡，俱称斐然。于鳞、元美，益以茂臻，接踵昔哲。虽其间规格有馀，未能变化，识者咎其鲜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后，正声渐远，繁响竞作，公安袁氏、竟陵钟氏、谭氏，比之自郅无讥，盖诗教衰而国祚亦为之移矣。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于是他根据对明诗发展变化的这样一个判断，又编成《明诗别裁集》，「十二卷，凡一千一百余篇」。

在当时的情况下，沈德潜编选这几部诗歌选集是相当艰难的。这不完全是当时资料方面的障碍：在文献资料方面，沈德潜在编《古诗源》时，有明冯惟讷的《诗纪》已经刊行；在编《唐诗别裁集》时，有曹寅的

《全唐诗》面世；至于明诗，选本也纷纷沓沓。相比较而言，资料的收集倒不是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在众多旗帜张扬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自己选诗的原则，以独领风骚。这又是谈何容易的事。比如王渔洋是主盟清初诗坛的领袖，他亲自选编《唐诗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盐酸之外也」，以弘扬神韵说，却「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仞摩天』者，或未之及」。自然而然，必然使唐诗正音少振响、唐诗精神受削弱。固然神韵说是对明代诗风的反正，矫枉过正，就必然使现实诗风走向空寂。要打击「神韵说」，沈德潜只好从大处着眼，重弹相依附于封建王权的诗教，一为能被最高王权者注意，二为能被具有正统思想的士人接受。这种出发点，由于现实的更激进的需要，他不得不叛离他的老师叶燮，特别强调「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邦教国，应对诸侯」。这当然也与他的诗观念有关，并不尽是外在势力的压迫所致，所以在他论诗时，贯彻了诗教立场，就某些诗篇的评价作出了与叶燮相反的结论。如叶燮对作为否定「温柔敦厚」的例证的《巷伯》「投界」文章加以曲解，说什么「《巷伯》恶恶，至欲『投界豺狼』、『投界有北』，何尝留一余地？然想其用意，正欲激发起羞恶之本心，使之同归于善，斯仍是温厚和平之旨也」。缘于此，他把一系列诗选命名为「别裁」。所谓「别裁」，是取杜甫《论诗六绝句》中的「别裁伪体亲风雅」句，意以诗教为主旨，以温柔敦厚为标准，裁定哪些是符合「风雅」的正体，哪些是违背「风雅」的伪体，于是就促使他的诗选笼罩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他的诗选招致后人物议的地方。我们应该首先明确我们的态度，同时还应有具体的历史分析。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文化氛围下，这只是沈德潜肯定自己的一种方式。

既然沈德潜诗选的活动，有关诗教的苦衷，那么从有关诗教而言，及诗坛上祛邪扶正而言，如何使二者统一起来，方能达到推动一切的目的？这就是沈德潜最为用心之处。也是他的诗选最见功力之处。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师承他老师叶燮的灼见，只能就诗论诗，就诗选诗。叶燮说：「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经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

以为事，倘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叶燮表达的思想所借助的概念较为隐晦，甚而有不清晰之处。细细寻绎，叶燮的思想要点在于「肖物」，即要反映万事万物的「理」、「事」、「情」，但又不是机械的反映，而是有概括，有虚构，有夸张，有想象，要完全具备诗歌艺术的要素。是这样的诗方为诗；不是这样的诗，无论内容多么突出，题材多么重大，都不为诗。至沈德潜，这一诗歌观念就更为明确，更为清晰。他说：「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这就把他的诗歌观念具体化了。所以他的选诗除「质直敷陈」者不取外，还坚持「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即使与他同时代的「名位、交游之念」，亦「不扰于中」。但对于无名者，则又有一番见解：「人之无名位者，一生无他嗜好，惟孜孜矻矻于五字之中者，而焉徂谢，苟无人焉表而章之，人与诗归无何有之乡矣。」因此，「予与同人远近征求，志其平生，聊存发潜阐幽之意。」对于闺阁诗，沈德潜亦取这样的态度。至于选编《清诗别裁》，沈德潜最初的刊印本，竟然不避时忌，选入被清廷视为贰臣的钱谦益、吴伟业的大量诗篇。因为在沈德潜看来，钱谦益的诗，「大约轻轻籍籍而重内典，弃正史而取稗官，金银铜铁不妨合为一炉」，「流风馀韵」，「百年以后」，「犹足警人」，应该脱离开当代对钱谦益的评估，于诗歌内在的价值作出应有的肯定。而吴伟业的「五七言近体」，在沈德潜看来，「声华格律不减唐人，一时无与为俦」，也是应该「特表而出之」的。由于沈德潜执诗史的执著态度论诗选诗，保证了他的诗选是彻头彻尾的诗歌选本，在诗教与诗艺方面取得了较为完善的统一，保证了他的志向顺遂实现。

诗选应该就诗论诗，然而诗却像一条流动的河，是由无数诗章前后左右密密麻麻组成的，因此只就诗论诗，既不能见其源，又不能见其流；既不能见其长，又不能见其为个别。论诗只能从诗歌发展流变中去论，选诗亦应如此。叶燮论诗有「正」、「变」、「因」、「创」的概念，他在讨论两对范畴时，特别强调既应尊重正，更应尊重变；既要尊重因，更应尊重创。正是有了正的变化、因的创，才有诗歌的流动，才有诗歌的发

展，把两者对立起来，就无疑是否定诗歌本身。沈德潜接受了叶燮的影响，他对叶燮的「识」、「胸襟」作了非常突出的强调。他说：「有第一等襟抱，有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同叶燮一样，沈德潜认为「胸襟」、「识」是造成诗歌「正」、「变」、「因」、「创」的内在根据。不过，沈德潜在理论上予以强调的同时，又在实践上予以身体力行，因此，他的每一个选本，都是每一个选本中诗所在时期的诗歌流变史；而汇合他的选本，又是中国诗歌的流变史。自然，真诗得以选出，而每个流派、每个个性的诗人的作品又都清晰地显现出来。他的每个选本都定有凡例，这些凡例决不止是关于一部书结构的表述，而是对每一个时期「正」、「变」、「因」、「创」的论述，这就是他选诗能从诗歌发展流变角度出发而凿凿之证，这又保证了他的选诗目的顺遂实现。

除此之外，沈德潜本身能诗，而且本身又有诗论的灼见，这些内在的因素，保证了他的选诗活动能够按照诗之为诗的原则进行。同时，他的年岁活得很长，几乎为一个世纪；而他官居显位，在时间上及资料占有上，又有优于他人一筹之处。另外，他还有一批弟子集中在他的周围，互相切磋，互相竞逐，从而又使他的生命得以扩大，使他的选诗事业得以顺利。总之，沈德潜殚精竭虑，使他的活动，发扬了中国的选学传统，甚而从某种意义上完备了中国的诗选学，这应该在中国诗歌史上大书特书。至今我们将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当然，由于当时的文献整理不尽完备，使他所据的版本不尽精当，因而他的诗选中也有不少失误。加之他的艺术观念依然属于封建形态的，所录之诗也不都是尽善尽美的诗篇。不过，毕竟瑕不掩瑜，他的诗选活动结出的晶莹果实，联缀成几乎全帙的中国诗歌选本，并且影响极为深远，这是我们应该特别珍视的。由于沈德潜的功绩昭著，而天又未能再延以时日，《宋诗别裁集》（凡八卷，六百四十五首）、《元诗别裁集》（凡八卷，六百十九首）是由另外的人编选的，当然这些虽然为附骥化的选本，却亦能递传其精神，且能弥补其未竟之业的遗憾。

由于这些选本风靡朝野，在以前就有人将《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

集》、《清诗别裁集》联缀在一起，命名为《五朝诗别裁集》予以出版。鉴于前代一直没有中国通史般的诗歌选本，而诗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精粹的部分，应予以传扬；加之目前一些总集性质的工程正在展开，即使这些工程全部完成，一是要等很长时间，二是一般的读者也购置不易，所以对《五朝诗别裁集》予以重新整理出版。值得说明的第一点是，《五朝诗别裁集》未收入《古诗源》，从而使隋以前的诗歌阙如，从源流来说，不能使读者尽睹源头，所以我们把《古诗源》整理后，纳入到这部书中，并易名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别裁集》，以求统一。收入后，前一种似与后五种在体例上不尽一致，沈德潜选诗是从诗教的立场别裁远离「风雅」精神的伪体，《古诗源》也贯彻这一精神。所以说，从本质上说，前后应是相一致的。值得说明的第二点是，解放后，林庚、冯沅君两先生曾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并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用新的诗歌观念、新的诗史观念编选的诗歌选集，它精选了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诗歌篇章，划出了中国诗歌发展史最为清晰的脉络，无疑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它选诗仅千首多一点，过于撷英，就显得中国诗歌的花朵稀疏了些，因而不能满足想更多更深入了解中国诗歌的读者的愿望。《中国历代诗歌别裁集》选诗八千馀首，我们希望它能够满足读者的要求，即使是资料性的要求，与我们的初衷相契，我们也就欣慰多了。值得说明的第三点是，汇编《古诗源》等六种选本，虽名为《中国历代诗歌别裁集》，但也有名实不尽相副之处。比如《诗经》、《楚辞》中的篇章未有选入，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因为不论从诗体着眼，还是从诗歌意象创造而言，它们都是任何诗歌选本应予以重视的。之所以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未能予以补苴，其一在于尊重原选本的面目，不想节外生枝；其二《诗经》及《楚辞》的全本及选本，凡是喜爱中国诗歌的读者，都有不等的藏本。当然还有另外的问题，似《清诗别裁集》只及有清一代三分之一时间的诗歌，其后的诗歌不止多，而且精。这之后的选本虽有，由于部头太大，联缀起来势必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故依《清诗别裁集》之旧，未再延续。值得说明的第四点是，《中国历代诗歌别裁集》是由孔令新、路英勇、尹奎友分头整理的。在整个整理过程中，从结构方式到整理意义，得到钱海骅、孟繁海、张立升诸先生的肯

定；至于得以印行，更是得到这些先生的全力支持，这是应予以特别志出的。

最后我们特别认为：任何一部成功的诗歌选本，决不止是那一个个别诗选者的成功，而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判断和抉择，所以它才能总结一代昭示未来。正是这样的原因，中国的诗歌历史不止有始有终，而且被这些成功的选本联缀成多姿多彩的风貌，催促并诱发着一代新的诗风。在《中国历代诗歌别裁集》出版之际，我们除了怀着特别崇敬的心情追怀那些在诗歌选编方面作出丰功伟绩的先辈，更多的则是呼吁，我们应当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总结他们的作为，以便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诗选学学科，为我们时代的诗歌繁荣与发展，为我们国家的诗歌繁荣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郁 守

一九九五年春

总目

《中国历代诗歌别裁集》与诗选学——代出版说明

..... 郁守

一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清〕沈德潜 编选 一

唐诗别裁集.....〔清〕沈德潜 编选 一五一

宋诗别裁集.....〔清〕张景星 姚培谦 王永琪 编选 四七七

元诗别裁集.....〔清〕张景星 姚培谦 王永琪 编选 五七七

明诗别裁集.....〔清〕沈德潜 周准 编选 六七九

清诗别裁集.....〔清〕沈德潜 编选 八四一

目 录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别裁集

(古诗源)

序

例言

卷一 古逸

击壤歌	七
康衢谣	七
伊耆氏蜡辞	七
尧戒	七
卿云歌	七
八伯歌	七
帝载歌	七
南风歌	七
禹玉牒辞	七
夏后铸鼎辞	八
商铭	八

麦秀歌	八
采薇歌	八
盟盘铭	八
带铭	八
杖铭	八
衣铭	八
笔铭	八
矛铭	八
书车	九
书户	九
书履	九
书砚	九
书铎	九
书杖	九
书井	九
白云谣	九
祈招	九
懿氏辞	九